

# 拨开“中等收入陷阱”的迷雾

##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 供给侧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刘世锦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重要转变,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于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多了起来。这个问题应放在长期增长框架下并在国际比较中加以分析。

##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

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潜力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工业化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呈下降趋势。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新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群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端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

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力度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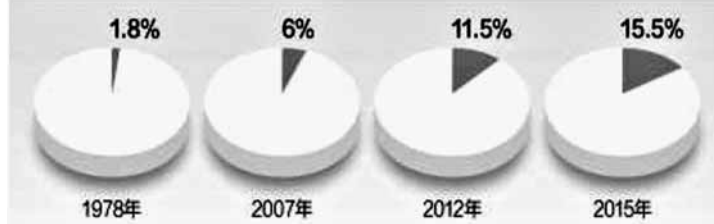
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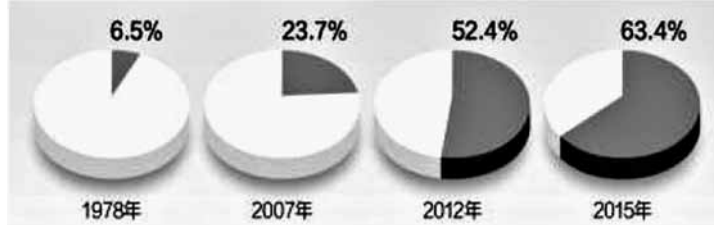
**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顺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以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成本。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 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



## 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观点集萃

# 未来几年中国迈入高收入阶段符合历史规律

目前,世界上高收入经济体大约有70个,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有十几个是发展中经济体。这70个经济体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迈入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个月。其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经济体有20个,它们实现这一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在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前后迈入高收入阶段是

符合历史规律和趋势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潜在通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灵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能够确保风险可控,为解决12年又4个月的问题赢得时间。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 三项改革释放巨大发展潜力

推动三项重大改革,能够释放巨大发展潜力,足以驱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跃升为高收入国家。

一是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通过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改革教育体制、实施重大科技工程、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吸引全球人才等举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这三项重大改革,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发展潜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 中国已经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不符合实际。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大都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长期稳定并且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二是持续改善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三是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当今中国显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因此,我们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悲观观点,可作简要回应。一是关于人口红利丧失问题。对此,可以通过更灵活的就业和退休制度予以弥补,还可以通过加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红利来替代。二是关于大国经济难以依赖外部市场发展的论调。外贸对大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确实相对有限,但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独特的发展优势足以弥补外需的不足。三是关于中国经济存在高杠杆的问题。这

个看法不符合实际。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大都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长期稳定并且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二是持续改善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三是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当今中国显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因此,我们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版文章均据6月12日《人民日报》)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扫码收藏本版文章

## 问题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

# 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

□郑秉文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后来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

## 展望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发展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划分和前瞻预测。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

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因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实行市场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在转型之初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达到2000~3000美元,转型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它们是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高速增长开始从高速增长挡为中高速增长,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中高速增长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上升至55.3%,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理念、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 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我国在跨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而美国已达5.5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对我国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谋划“三步走”战略时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标来描述,中等发达国家大约相当于2015年韩国所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2.7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2.6万~3.0万美元(2015年价格)。这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

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尽管将迎来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目标。从前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所显示的经验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动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检验。越是在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二战后两批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两条正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条基本经验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释放经济潜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软实力属于“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有形要素。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应加倍重视,将其作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要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还要强、还要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